

辽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南齐书 梁书 陈书 魏书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南史 北史 旧唐书 新唐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 辽史 金史 元史

# 文白对照 二十四史

精华

旧五代史·新五代史（一）

主编 廖盖隆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# 毛泽东读《旧五代史》

《旧五代史》一百五十卷，包括本纪六十一卷，列传七十七卷，志十二卷。它原名《五代史》，又称《梁唐晋汉周书》，后来为了区别于《新五代史》，前面冠一“旧”字。

唐哀帝天祐四年(907年)，朱温夺取了最高统治权，建立了后梁。以后五十多年间，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几朝封建政权。中原以外有吴、南唐、吴越、楚、闽、南汉、前蜀、后蜀、南平、北汉等十个割据政权，史称“五代十国”。《旧五代史》记载了这段历史的演变。

宋太祖开宝六年(973年)，命薛居正监修五代史，参加的人有卢多逊、扈蒙、张澹、李昉等，第二年就完成了编写工作。成书如此之快，是因为作者有范质的《五代通录》为蓝本，并有各朝实录可资利用。

《旧五代史》按五代断代为书，梁书二十四卷，唐书五十卷，晋书二十四卷，汉书十一卷，周书二十二卷。五书的后面，有《世袭列传》二卷，记载李茂贞、马殷、钱谬等人。他们割据一方，但名义上仍向中原称臣，所以特地给他们创立《世袭列传》。另外，还有《僭伪列传》三卷，记载杨行密、李昇、王审知等人。他们独霸一方，称王称帝，不用中原正朔，作者认为这

是“僭伪”政权，把他们列入《僭伪列传》。

《旧五代史》在整理史料和文字润色方面，没有下过多少功力。但与《新五代史》相比，它又独具长处。薛居正经历了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，熟悉当时的历史，搜集史料有许多便利条件。所以《旧五代史》叙事比较确切详尽，史料相当丰富。这部分中也留有毛泽东不少批注。

## 习水能泳是好事情

《旧五代史》卷十七《雷满传》载：

雷满，武陵洞蛮也。……又尝于府署浚一深潭，构大亭于其上。每邻道使车经由，必召筵于中，且言：“此水府也，中有蛟龙，奇怪万态，惟余能游焉。”或酒酣对客，即取筵中宝器乱掷于潭中。因自褫其衣，裸露其文身，遽跃入水底，偏取所掷宝器，戏弄于水面，久之方出，复整衣就座，其诡诞如此。

在这里，毛泽东批注：“此人习水是好事”。（见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第257页）在读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卷四十一《雷满传》毛泽东又批道：“此人能泳”。（见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第271页）

雷满是湖南武陵少数民族，时逢唐末乱世，雷满在当地建立土团军，先是投入荆南节度使高骈麾下，后自己占领朗州，被唐昭宗封为朗州节度使。其为人勇悍。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皆列有本传。毛泽东对这两种书上的《雷满传》都有圈画，特别注意到他潜水取物，好泳作乐的事情，批注说能习水是好事情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本人一生爱好游泳的兴趣。

《旧五代史》卷六十《李袭吉传》，说李袭吉有一次随李克



用征战，在一个叫夏阳渡的地方过浮桥时，“竿断航破，武皇（后唐李克用）仅免，袭吉坠河，得大冰承足，沿流七八里，还岸而止，救之获免。”读至此，毛泽东不相信李袭吉只是靠一块浮冰才没淹死，遂批道：“不学游水，此人几死。”（见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第1102页）

《新五代史》卷四十七《华温琪传》记载，后来曾当过后梁、后唐的节度使的华温琪，早年曾参加黄巢的农民起义军，义军攻陷长安后，为供奉官都知。黄巢起义失败后，他逃往滑州，担心自己状貌魁伟，长相特殊，被官军认出，于是，“投白马河，流数十里，不死，河上人援而出之。”读至此，毛泽东批道：“此人必略知水性”。（见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第1102页）

姚鼐的《古文辞类纂》“论辨类”收了苏明允的《谏论》，其中有一段议论，说有三个人，一个勇敢，一个既勇敢又怯弱，一个怯弱。如果他们三人同时站在一个“渊谷”傍，有人对他们说：你们谁跳过去，便是勇敢，谁跳不过去，便是胆小。那么，后两个人肯定跳不过去。如果有人对他们说，谁跳过去，就能得千金，那么，那个半勇敢的人为利驱使，也会跳过去。如果，这时有一只猛虎向他们扑过来，即使没有人对他们许诺什么，那个胆怯的人也会和前两个人一样跳过去。读至此，毛泽东批注说：

“看何等渊谷。若大河深溪，虽有勇者，如不善水，无由跳越。此等皆书生欺人之谈。”（见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第1102页）

## 朱温狡猾

《旧五代史》卷一《梁书·太祖本纪》载：

八月己丑，帝遣丁会急攻宿州，刺史张筠坚守其壁。会乃率众于州东筑堰，壅汴水以浸其城。十月壬午，筠遂降，宿州平。十一月丁未，曹州裨将郭绍宾杀刺史郭饶，举郡来降。是月，徐将刘知俊率众二千来降，自是徐军不振。十二月，兖州朱瑾领军三万寇单父，帝遣丁会领大军袭败之于金乡界，杀二万余众，瑾单马遁去。景福元年正月，遣丁会于兖州界徙其民数千户于许州。二月戊寅，帝亲征郟，先遣朱友裕屯军于斗门。……

在此，毛泽东批注：

“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，而狡猾过之。”（见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第254页）

唐代末年，社会动乱，至唐僖宗已达顶点。特别是在王仙芝、黄巢起义的打击下，唐王朝更迅速地走向彻底崩溃之途。曾为黄巢部将的朱温（852—912），于唐中和二年（882）叛变投降唐王朝，赐名全忠。次年，为宣武节度使。这时，藩镇割据之势已完全不可控制，同东汉末的情况很相似，军阀们纷纷占领土地，进行混战。朱温到宣武镇任节度使时，只有所部数百人，在四面都是强藩割据的环境里，所以，毛泽东说“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”。朱温勇于作战，又长于谋略，从弱小的地位逐渐变成强大，先后攻破秦宗权、时溥、朱瑄、朱瑾、刘仁恭、王师范等军阀，并把势力最大的军阀李克用压制在河东一带。到唐天佑二年，拥有关中和关东广大地区，成为唯一强大



的军阀，初步统一了黄河流域。907年建立了梁朝，史称后梁。在整个开国战争中，朱温采用了一些成功的谋略，并且还像曹操一样，把唐昭宗劫到自己的辖地洛阳，搞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那一套，同时对不同的军阀采取不同的方针。故毛泽东说他的狡猾甚至过于曹操。但他用“狡猾”二字评价，见得有些贬意，朱温是不能与文武全才的曹操相比的。

## 危急之秋亦转守为攻之时

《旧五代史》卷二十六《唐书·武皇本纪》载：

(天复元年)四月，汴将氏叔琮率兵五万，自太行路寇泽、潞，魏博大将张文恭领军自新口入，葛从周领兖、郛之众自土门入，张归厚以邢、锚之众自马岭入，定州王处直之众自飞狐入，侯言以晋、绛之兵自阴地入。氏叔琮、康怀英营于泽州之昂车。武皇令李嗣昭将三千骑赴泽州，援李存璋而归贺德伦。氏叔琮军至潞州，孟迁开门迎，沁州刺史蔡训亦以城降于汴。氏叔琮悉其众趋石会关。是时，偏将李审建先统兵三千在潞州，亦与孟迁降于汴。及叔琮之入寇也，审建为其向导。汴人营于洞涡，别将白奉国与镇州大将石公立自井陘入，陷承天军。及攻寿阳，辽州刺史张鄂以城降于汴，都人大恐。时霖雨积旬，汴军屯聚既众，刍粮不给，复多痢症，师人多死。时大将李嗣昭、李嗣源每夜率骁骑突营掩杀，敌众恐惧。

五月，汴军皆退。氏叔琮军出石会，周德威、李嗣昭以精骑五千躡之，杀戮万计。

读此，毛泽东批注：

“沙陀最危急之秋，亦即转守为攻之会，世态每每如

此，不可不察也。”(见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第257页)

唐昭宗天复元年(901)，朱全忠(朱温)集中兵力攻打河东李克用(文中称“武皇”)的一次战役。朱全忠和李克用，分别为唐王朝封的梁王和晋王，事实上是当时军阀割据中两股最大的势力。唐光化三年(900)，朱全忠控制整个河北诸镇后，试图一鼓作气攻取河东(即今山西一带)晋王李克用所占领的地方。

天复元年一月，朱全忠派张存敬攻占了晋、绛两州(即今山西临汾市、新绛县)，又迫降了河中节度使王珂(李克用之婿)。四月，朱全忠又发六路大军，分进合击晋阳。面对强大攻势，李克用的一些部下不战自降，使朱全忠的主力氏叔琮部顺利进占泽、潞两州(今山西晋城县和长治市)，出石会关(今山西榆社县西)逼近了晋阳。与此同时，由马岭(今山西昔阳县东南)南下的张归厚部到达辽州(今山西左权县)，并迫降辽州刺史张鄂，由井陘西进的白奉国部也攻拔承天(今山西平定县东)。几路大军，合围晋阳城下。所以，毛泽东在批语中说这是“沙陀最危急之秋”。李克用是少数民族，属沙陀部。但毛泽东认为，危急中也包含着“转守为攻”的机遇，就看你能不能做出判断和选择。李克用恰恰做到了这一点。他派大将李嗣昭、李嗣源率精兵强将每夜出城袭营掩杀，造成敌兵的极大恐慌。加上敌军粮草供应不济，士卒多患疾病，于5月朱全忠不得不下令全部撤军。李克用又派精兵追击，杀获甚众。

毛泽东根据这一战例，提出“最危急之秋，亦即转守为攻之会”，并认为“世态每每如此，不可不察”，大概也包含有他在中央苏区时期，成功地领导三次反“围剿”战争的经验体会。



## 攻者愚 守者智

《旧五代史》卷六十二《董璋传》载：(长兴)三年四月，璋率所部兵万余人以袭知祥。《九国志·赵季良传》：“季良尝与知祥从容语曰：‘璋性狼戾，若坚守一城，攻之难克。’及闻璋起兵，知祥忧形于色。季良曰：‘璋不守巢穴，此天以授公也。’既而璋果败。”知祥与诸将率师拒之，战于汉州之弥牟镇。璋军大败，得数十骑，复奔于东川。

读此，毛泽东批道：“攻者败，守者胜，攻者愚，守者智。”

董璋和孟知祥都是后唐将领，分别为东川和西川节度使，对朝廷都有二心，曾互相联络。后唐明宗长兴元年(930)，朝廷夺取董璋官爵，杀了他在朝为官的儿子，并派兵攻讨东川，没有成功，遂用怀柔政策，让东川和西川各自保境安民。孟知祥派人向董璋建议，两人连表向朝廷称谢。董璋认为，对朝廷都有二心，可偏偏是自己的儿子被杀，是孟知祥背叛了自己，取得朝廷的信任。于是在长兴三年(932)离开东川去攻打孟知祥的西川，结果大败而归。毛泽东读至此，很注意书中引用的一个注，即孟知祥手下的赵季良对董璋离开自己所占之地，奔袭西川的分析，认为这是扬短避长，必然失败。毛泽东由此发挥，认为在这种情况下，常常是进攻的人愚蠢，坚守的人聪明，结果必然是“攻者败，守者胜”。

其实，这时董、孟二人共同的敌人是朝廷。在外敌压力面前，二人理应联手，董偏要互相残杀，其取败者一；但凭一己猜忌，出师无名，取败者二；以万骑离开巢穴攻击有备之敌，取败者三；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说“攻者愚，守者智”的道理。



## 《旧五代史》概论

《旧五代史》，原称《梁唐晋汉周书》或《五代史》、《五代书》。由北宋薛居正于宋太祖开宝六年(973)四月至七年闰十月奉旨监修，卢多逊、张澹、李昉等同修。后欧阳修撰成《五代史记》，称为《新五代史》，遂称薛史为《旧五代史》。原书已经佚失，现行本为清代乾隆四十年时的辑本。全书一百五十卷，记叙公元907年至959年共五十三年间中原地区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五个王朝以及南北方的吴、南唐、吴越、楚、闽、南汉、前蜀、后蜀、南平、北汉等十个割据政权的史实，是记载五代十国各民族历史的一部重要的官修正史。

薛居正，字子平，开封浚仪(今河南开封市)人。生于后梁乾化三年(912)，卒于北宋太平兴国六年(981)。后唐清泰初年进士及第。后晋由华州署府从事累迁至开封府判官。后周迁比部员外郎，领三司推官，累官至刑部侍郎。入宋后历任户部侍郎、兵部侍郎、吏部侍郎，兼判门下侍郎事，后官至门下侍郎平章事(宰相)。北宋开宝六年(973)四月，以副相身份受诏



监修《五代史》。

薛居正一生为官勤勉清正，屡有政绩；为人性孝行纯，谦和谨慎。自幼好学不倦，善著述，有辅公之才。宋初居官二十年，深得太祖、太宗两朝君主赏识。又兼身经六朝，历仕四代，熟谙五代掌故，目睹王朝藩国的盛衰陵替。宋初循宰相修史旧例，监修《五代史》的任务，就自然落到了薛居正身上。

与薛居正同修《五代史》的，还有卢多逊、李穆、李昉、扈蒙、张澹、刘兼、李九龄诸人，都是当时文坛耆宿、学界名流。在以薛居正为首的这一编撰班子中，除李九龄为入宋初仕者外，其余皆为历仕数朝的遗老旧臣。他们身经朝代更迭、世事沧桑、战乱流离、生灵涂炭的悲惨历史，又感恩于畴昔故主先王的知遇提携，感情是复杂、矛盾的，感触是深刻、沉重的，因而在涉及一些具体的人、事时常常褒贬并存、瑕瑜互见。他们对五代乱世有切肤之痛，这种深切的体验汇入笔端，在《旧五代史》的诸多纪传志序中就表现出自己对于王朝兴废、政治得失、军事胜败的深刻反思，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，体现出具有进步意义的史学观点。

首先，在对五代十国频繁的王朝兴废究竟是系乎天命，还是在于人谋这一重大命题的探索上，作者提出了王朝兴废关键不在于天，而在于人的进步史学观点。通观《旧五代史》，几乎所有纪论、传论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于此、归结于此、感慨于此。由于历史的局限，《旧五代史》中同样不乏王者受命于天的怪异荒诞的记述，然而在具体叙述历史时，作者常常是借天命而推演人谋，甚至排斥天命径谈人谋。例如对于后梁的覆没，作者以“史臣曰”的形式总结道：“末帝仁而无武，明不照汗，上无积德之基可乘，下有弄权之臣为辅，卒使劲敌奄至，大

运俄终。虽天命之有归，亦人谋之所误也。”又如，在评述后唐所以失政时，作者感叹：“倘使重诲得房、杜之术，从荣有启、誦之贤，则宗祧未至于危亡，载祀或期于绵远矣。”以人事而论兴亡成败，是贯穿《旧五代史》的重要主题，这是阅读和研究《旧五代史》应首先注意的。

其次，既然立足于从人事活动上探究历朝兴废的原因，因而善恶并书、贬恶扬善就成为《旧五代史》的另一主题。后人多认为《旧五代史》颇多粉饰回护虚妄失实之处。具体说来，作者对于五代人事的褒贬可分为两类。①对于本纪中五代帝王的历史，出于作者对于故主先王的感情，确有不少回护之处。然尚不可一概而论。从大的方面来看，作者的褒贬评价仍是比较客观的。②对于列传中的不同人物，作者善恶并收，击浊扬清。对于同一人物，作者瑕瑜互见，优劣并陈，尽可能体现人物的功过是非，极少有回护曲笔。这一方面体现了作者想追循古之良史秉笔直书的优秀传统，另一方面更体现了作者以史为鉴，将五代乱世的善恶因果提供给时人参照的意图，这样就更接近于历史的本来面目，因而这种作史态度也就具有积极意义。

## 二

《旧五代史》计本纪六十一卷，列传七十一卷，志十二卷。编撰方法是以占据中原的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个王朝为主体断代为书，包括《梁书》二十四卷、《唐书》五十卷、《晋书》二十四卷、《汉书》十一卷、《周书》二十二卷。各书均分本纪和列传两种，列传又按后妃、宗室、诸臣次第排列。五书后以杂传七卷



为附体，记叙南北十个割据政权和周边其他民族国家的历史。其中以《世袭列传》二卷记载荆南、楚、吴越三个独立成国但仍向中原王朝纳贡称臣的割据政权。以《僭伪列传》三卷记载吴、南唐、闽、南汉、北汉、前蜀、后蜀七个不奉中原正朔的割据政权。以《外国列传》记载契丹、吐蕃、高丽等国内外十二个民族国家的历史。杂传后有志十二卷，分为天文、历法、五行等十目，综述五代时期的典章制度。面对五代十国这一大的分裂割据局面，作者采用以中原王朝的兴废为主线，十国的兴替和四夷的起落为副线这样一种断代分国的叙述方法，条理清楚，内容连贯，彼此呼应，较好地体现了这段历史的全貌。

北宋开宝六年(973)四月，宋太祖诏令薛居正监修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代史，至次年闰十月编修完成，历时仅一年零六个月，成书之速仅次于历时六个月的《元史》。这种罕见的修史速度是由内因，外因两方面原因促成的。

首先，从外因方面看，五代十国是由唐末藩镇割据演变成的分裂混战时代。五代的开国君主，均为前朝重臣镇将，他们都是依靠手中兵权凭武力推翻前朝的。五代各朝立国短促，后梁十七年，后唐十三年，后晋十年，后汉三年，后周十年。军阀混战不息，朝代更易无常。宋太祖赵匡胤原为后周殿前都点检兼宋州归德军节度使，也是靠在陈桥驿发动兵变而夺得皇位的。赵匡胤在夺得皇位后，为防止擅权篡位故事的重演，保证赵宋政权享运长久，其要务之一就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，深究五代王朝“其兴也勃，其灭也忽”的根本原因。赵宋开国仅十三年就诏修《五代史》；《五代史》撰成后第二天赵匡胤即展卷阅读并对宰相说：“昨观新史，见梁太祖暴乱丑秽之迹，乃至如此，宜其旋被贼虐也。”可见其急欲“以史为鉴”的用心。



同时,五代君臣失道,朝纲隳堕,礼崩乐坏。宋初帝王继乱世之后痛定思痛,急欲偃武修文,网罗文士,复振朝纲,重修礼乐。

其次,从内因来看,《旧五代史》成书之速,除了修撰者大为五代遗老旧臣、著名史官,熟谙史料外,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,即有丰富的五代史料可资凭借。五代王朝更替频繁,但史馆史官未废,各朝实录得以及时修成。丰富的现成史料为修撰五代史打下了基础。薛史采据历朝实录,参考《五代通录》,简节改编,故能很快成为一节。正因为《旧五代史》大多取材于历朝实录,而实录的编撰者多历前朝或任职该朝,这样很容易造成笔削回护之处、粉饰附会之言。同时在取材范围上,由于实录基本上只记叙各朝的朝政纲略,对中原以外各地区以及民间社会生活的叙述就过于简略单薄。此外,由于《旧五代史》脱胎于历朝实录,在编撰上就带有较浓厚的“实录”痕迹,即在六十一卷本纪中对于所叙帝王的起居行止的记载过于琐细,文字繁猥,文体平弱,质胜于文,在问世不久就受到批评。这就为以后该书的行之不远以至最后失传埋下了病根。

《五代史》成书后约八十年,北宋名臣欧阳修私撰成《五代史记》七十四卷藏于家。宋神宗熙宁五年(1072),诏取欧阳修《五代史记》付国子监刊行,由此新、旧二史并行于世,遂称薛史为《旧五代史》,欧史为《新五代史》。南宋时《旧五代史》已不甚流行。至金章宗泰和七年(1208),诏令学官削去《旧五代史》,只用《新五代史》,于是《旧五代史》渐废,元明以来就罕有援引薛史者,传本也慢慢湮没。明永乐年间修《永乐大典》收录《旧五代史》,但割裂分散,已非原本篇第之旧。清乾隆年间修《四库全书》时,就已找不到《旧五代史》原本。馆臣邵晋涵



等只得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所有散录进去的《旧五代史》部分，经排比审定，尚有残缺。于是复从《册府元龟》、《资治通鉴考异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五代会要》等书中辑录史文，或作正文，或为附注，以补不足，这样才算恢复了原书面貌的十之八九，这就是目前能看到的辑本《旧五代史》。乾隆诏令将辑本《旧五代史》刊入二十四史，终于使《旧五代史》在七百年后再行于世并重新进入正史行列。原本是否尚存人间，至今仍是疑案。

现今《旧五代史》版本毕竟还是辑本，有些纪传零落残缺，内容不相连贯。所辑十志亦多不全。现在通行的《旧五代史》是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的校点本。该本以民国十年（1921）丰城熊氏影印南昌彭氏之藏本为底本，同时参校其他各本，适当吸收了邵晋涵等的批注校勘，对辑本有错漏处尽可能予以改正增补，所以校勘最精，又加以新式标点，是目前最完善的一个本子。

就《旧五代史》与《新五代史》的比较而言，旧史叙事烦冗，文体平弱，较多曲笔。但取材广泛，叙事详尽，材料翔实可信，保存了许多原始资料，有较高史学价值。所以司马光撰《资治通鉴》，胡三省作《通鉴注》，都以旧史为据而不取新史。



文 史 英 华



